

郑观应与孙中山

——纪念郑观应诞辰170周年

●张 磊

在19世纪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堪称“两异性相搏、相射、短兵紧接而新旧嬗代之时也”^[1]。郑观应同孙中山有过颇为密切的交往，相互切磋探讨“救国之策”。他们的交往和友谊虽然未能持续长久，但却含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他们的交往和友谊并不是偶发的。

两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郑观应出生于兼具传统文化与近代商业经营的家族，幼习八股，应童子试落第，旋即“赴沪学商务”^[2]。孙中山生而为“贫困之农家子”^[3]，从小就参加农业劳动。郑观应长期担任买办、洋务派企业和民营企业主管。作为爱国、进步的维新思想家和实业家，闻名于当世。孙中山则更少传统因袭的重担，青少年时期业已接受了“欧洲式的教育”，并从爱国、变革走向民主革命，实现了自我超越。此外，他们的年龄也很悬殊。两人相识的时候，前者的岁数是后者的年龄的一倍左右。

两人之间也有相同之处。他们都诞生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与对外开放先于内地的广东珠江三角洲香山县，濒临南海，毗邻澳门，侨乡的地缘和社会氛围利于人们睁眼看世界和产生变革观念。他们都较早地从故乡走向外部世界：郑观应“自幼海舶遍历越南、暹罗、新加坡等处，熟悉洋务”^[4]。孙中山则在13岁时踏上泊在澳门的英轮前往夏威夷。此行使他开阔眼界，留下了深刻的感受：“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5]。他们都满怀爱国与变革热忱，80年代中期爆发的中法战争给予两人以极大的激励。郑观应上书清廷，呼吁抗战，还在香港对相识的英国军官满怀忧虑地谈及祖国现状，表示当提出救亡与革新的主张和方案。由是发愤著述，并在90年代初完成了影响深远的《盛世危言》一书。孙中

山更从香港工人拒修法舰和装卸法货的正义行动受到启示^[6]，相信“中国人已有相当觉悟”，因而自称“余自己酉中法战后，始有志于革命”^[7]。显然，他们经由爱国主义的理性思考而走向实践性的变革，希冀中国踏上近代化道路，臻于繁荣富强。

郑观应与孙中山的相同之处，使他们在19世纪末期彼此结识、相互切磋，满怀热忱的探求救亡和进步的途径，提出社会变革的方案，尤其侧重于经济的发展。但是，两人对时代潮流的认识和历史使命的抉择决定了这种友谊只能是短暂的。然而，他们曾经的共识对后来的思想演变还是影响长远的。

(一)

从爱国走向变革，郑观应与孙中山的变革思想在初识阶段颇为类似，他们以开阔的眼界观察世界，确认除旧布新是绝对必需的。彼此的观念存在许多共识，甚至一致。郑观应当时已有从事兴办实业的经验，而且对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教育方面提出了不少改革的卓见，且撰有《救世揭要》、《易言》等著述面世，影响深远的《盛世危言》一书业已构思成熟。孙中山则在香港读书和习医期间接受了比较系统的“欧洲式”教育，萌发了社会变革的思想，积极探索救国与富强之路。已届中年的、具有相当完整深刻的维新思想的郑观应同年轻的、渴望革新的医科学生、医师孙中山相识后，很快成为知己。前者在《盛世危言》和致盛宣怀的信函中盛赞了孙中山：“敝邑有孙逸仙者，少年英俊。曾在香港考取英国医士，留心西学，有志农桑生植之要求，

欲游历法国讲求养蚕之法，及游西北省履勘荒旷之区，招人开垦，免致华工受困于外洋。其志不可谓不高，其说亦颇切近，而非若狂士之大言欺世者比。”^[8]。后者对前者的比较系统的社会变革主张，显然也是十分赞同。郑观应的广博学识丰富阅历和处世经验，又恰是孙中山“入世之媒”。因之，这对忘年交中的幼者必然从长者那里受到许多影响。

直接显示郑观应与孙中山的共识的思想素材主要有二，即《农功》篇及《上李鸿章书》。

《农功》收入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初版五卷本），表明了他对此篇内容的重视和与其的密切关系。因为，《盛世危言》所收他人的著述大都冠原作者名并且置于附录部分。郑观应一直十分重视农业的经营和改革，从70年代即开始构思的《易言》一书就已论及农业的拓展。《盛世危言》中更是充分肯定了“中国伊古以来，以农桑为本。内治之道，首在劝农。阡陌广开，闾阎日富。似于耕作垦荒之事，我行我法得以自用其长矣”^[9]。主张以“工商立国”、强调“商战”严重意义的郑观应并未对农业掉以轻心，而是继承和发展了这种重农传统，提出了一系列推进农业的方案。文中还记述了孙中山的活动，采用第二人称的方式则适合自己的身份。从行文的遣词造句看来，也与全书的风格一致。显然，《农功》确是经过郑观应的手笔——参与原创；抑或修改润色。至于孙中山与《农功》同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也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孙中山曾对戴季陶提到《盛世危言》采用过他的两篇文章，陈少白更肯定其中一篇是关于农业的，冯自由则具体指出《农功》系孙中山所作。此外，《农功》的思想同孙中山当时十分重视农业改革发展的观念完全一致。与他先前的《致郑藻如书》对比，端倪可见。同稍后的《上李鸿章书》相较，不仅内容基本相通，且《农功》中有记述孙中山“颇留心植物之理”和“尚欲游学欧洲”，亦应是前后呼应和存在因由的。他们之间的关系及共识，由此可见一斑。因此，《农功》也必然经过了孙中山的手笔。关于《农功》的具体写作过程难以

探究，较为确切的论断应是：《农功》体现了他们共同的观念，反映了两人的思想交流，极有可能是由孙中山草成后，再由郑观应定稿。

《上李鸿章书》是孙中山踏上社会舞台初期的重要文献。其内容也与郑观应的思想颇为类似。后者在1893年定稿的《盛世危言》的“自序”中曾提出了强国富民的三项准则：“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畅其流”。慨叹侈谈洋务者虽众，

但如“经求其洞见本源，深明大义者有几人哉！”孙中山在《上李鸿章书》中阐述了作为“富强之大经”、“治国治大本”的“四事”，即“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认为“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者，徒唯船坚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10]。显然，郑观应的三点要义与孙中山的“四事”全然相通。尽管，前者缺少了“物能尽其用，”但通观两文从思想到词句如出一辙。甚至对30年来兴办洋务的批评亦甚相似。郑观应积极支持了孙中山最初的政治活动，当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此外，郑观应在1890年完成的《中外卫生要旨》及《备急验方》等书，可说隐约显示了他与孙中山的思想交流的又一方面，即涉及了医药学领域。郑观应自称“少习岐黄”，“病久成医”，对中医药颇有研究，同时对西医药亦颇赞同，认为“中西合璧，必能打破中西界限，彼此发明，实于医学大有裨益”^[11]。更在《医道》中称赞了西方的医疗体制，肯定了西医的优长。还对西医教育作了颇为具体的论述，确认能使从医者的“学问阅历精益求精”。可以断言，郑观应关于西医的见识固然与他在港、澳长期居留有关——澳门是在中国领土上最早实施西医医疗体制的地区，当地的白马行医院于1568年即已创办。但是，与他交往密切的香港西医书院的学生、澳门镜湖医院的首位华人西医孙中山必然会在相关的许多问题上给郑观应以影响。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包括医学在内的西方自然科学属于西学的重要部分，而他们都是主张和实行向西方

学习，并在对待西医问题有着共同语言。只是双方未能更多交流，迫切的重大社会经济、政治等课题压倒了他们对其的关注。

(二)

在孙中山的初期政治活动中，北赴天津上书李鸿章显然是一桩重要政治事件。上书的内容当然得到了郑观应同意，而这种和平的、自上而下的变革社会的方式亦为郑观应所认可。因之，孙中山的上书行动必然得到了郑观应的积极支持和热情帮助。显然，这是他们在政治生涯中的首次——也是仅有的一次合作。

上书李鸿章不是偶然的，其时，孙中山已经“以医术为入世之媒”，投入变革现实的广泛社会活动。他以广州为主要基地，团聚了不少志士，并且“结纳会党，联络防营”，还同水师中的青年军官建立了密切联系。组织革命团体的课题

已经提上日程，宗旨定为“驱除鞑虏，恢复华夏”，只是由于参与人数较少等原因而未能形成“具体的组织”。当然，孙中山终归还未跨出决定性的一步。他认为当前的变革途径有二，即是中央革命和地方革命。如果上书得到采纳，意味着实施自上而下的中枢变革，与自下而上地开展反清斗争的地方革命相较，易于奏效：“维新之机，苟非发自上，殆无可望。”选择李鸿章为上书对象也是有理由的。他不仅是权倾一时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更以兴办洋务闻名于当世，且为西医书院的名誉赞助人。郑观应则长期参与洋务活动，与李鸿章关系颇为密切。

1894年初，孙中山与陆皓东回到故乡起草了《上李鸿章书》，又同在穗的陈少白反复推敲，然后于这年春天启程北上。《上李鸿章书》提出了“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和“货能畅其流”的主张作为“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认为“以中国之人民才力，而能步武泰西，参行新法，其时不过二十年，必能驾欧洲而上之”^[12]。他们在上海稍事

逗留，拜访了时任招商局帮办的郑观应等，再次修改了《上李鸿章书》，并请郑观应为介于李鸿章的下属和幕僚。郑观应欣然允诺，转托他的挚友盛宣怀向李鸿章引荐。他在信中再次称赞了青年孙中山的志向远大，“兹欲北游津门，上书傅相，一展其胸中之素蕴”^[13]，希望得到李鸿章的支持，并得领取出国护照，“以利遄行”。不过，忙于中日外交与军事冲突的李鸿章并未理会来自粤东的投书者，孙中山只是领得一纸“农桑会出国筹款护照”，未能取得预期效果。然而，却也促成了孙中山思想与实践的飞跃。

(三)

就其内容而言，《上李鸿章书》全然属于维新思潮的范畴，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促进中国近代化的意义，体现了社会发展的趋势。然而，维新思潮与运动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难以实现自身的目标。外国侵略者和反动统治者甚至连“跪着的造反”——列宁形容温和变革的用语——都不允许，而维新派的社会阶级基础又较薄弱。孙中山开始意识到这种严峻的现实，上书的失败又给他以极大刺激，“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加以中日战争爆发，民族危机空前深重。他的“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切”。孙中山的思想演变历程达到临界点，实现了自我超越。他于这年11月在檀香山建立了革命民主派的第一个团体——兴中会，入会誓词把奋斗目标定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建立合众政府”^[14]。兴中会十分重视武装反清斗争，孙中山于翌年初，在香港建立了兴中会总机关后立即策划广州起义。这次发难虽然流产，孙中山和他的战友被迫长期流亡国外，但却标志着革命民主派“战争事业”与走向共和的发端，从此，近代中国民主革命从准备阶段进入正规阶段。

兴中会建立与广州起义标志着革命民主派的诞生，开拓了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新时期。

孙中山的历史性跨越并非偶然。他不同于半

封建半资本主义式的维新人士，较少承受因袭的重担。正如他所自述：“生而贫，既不能学八股以博科名，又无力纳粟以登仕版。”^[15]幼年和少年时代，他是在贫苦农家和华侨企业家的生活环境中度过。受过比较完整的“欧洲式教育”，颇为了解西方社会，精神世界中蕴含着激进的民主主义因素。在他看来，古老的帝国和至尊的皇冠并非永恒和神圣的，否定现存社会秩序的造反也决不是大逆不道。因之，在一定机缘下迈出了关键性的步伐，开始了新的征程和创造了新的局面，赋予近代中国民主革命以更为完全的意义。

但是，孙中山的与时俱进却使他在政治、思想和实践上同郑观应疏离。后者没有同现存政权决裂，未能突破君主立宪的藩篱。“道不同不相为谋”，曾经是如此密切的朋友，结束了交往和情谊。他们后来没有保持联系，甚至几乎没有相互提及。郑观应对孙中山的革命活动缺乏理解，也未赞同。只是在他的晚年，曾经对袁世凯以御用的《中华民国约法》取代南京临时政府时期颁布的具有民主和进步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表示愤懑，斥之为“民主独裁之专制”，即盗用“民国”称号实行“独裁”、“专制”。郑观应反袁的政治表态客观上支持了孙中山的捍卫共和的斗争，成为他们短暂友谊中断后的唯一回声。

但是，郑观应和孙中山在许多经济与社会发展课题上的交流，却并未因为友谊的中止而断绝，他们后来各自的探索并未否定原来的“兴国”共识。尽管两人走上了不同的道路，那段密切交往中充溢的爱国情怀、变革热忱则是难以忘却和消弭的。试把《盛世危言》与《实业计划》以及其它相关著述加以比较，当可发现不少脉络相通和类似之处。当然，重大的差异使得这种类比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无论是在领域方面或是理念方面，都是如此。

显而易见，郑观应对近代化途径的认识胜于不少同时代的维新人士。他的观念和方案比较深刻全面，涉及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意识形态诸层面。他十分重视社会经济的变革与发展，强

调提高生产力：“使中国所需于外洋者，皆能自制；

外国所需于中国者，皆可运售。而又重订税则，厘正捐章，务将进口之税大增，出口之税大减，则漏卮可以渐塞，膏血可以收回。”^[16]郑观应意识到西方列强是工业化得最大障碍，指斥侵略者“挟全力以俱东，争开口岸，勒定条约，设领事以资保护，屯兵船以壮声威。或勒免卡厘税，或侵占小民生计，取求无厌，要挟多端，必遂其慾而后止。”^[17]他制订了应对的各项举措：

“欲攘外，亟自强。欲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速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他提到了宪法的制订和政治的改良，也批评了清政府的“不自振作”、未能“保护”工商业，但却对现存社会秩序采取“改良”办法。他确认“君主者，权偏于上，民主者权偏于下，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因之，君主立宪方是理想的政治体制。这种保守的政治主张给他的纲领造成重大的局限，一整代维新志士大都未能跨出君主立宪的藩篱。严酷的现实却是：在殖民主义与封建主义双重枷锁下，反动统治者顽固地维护着旧制度，甚至连温和的改良亦不容许，戊戌变法的昙花一现就是例证。“强迫”的手段在这里是必需的，曾为郑观应所赞助的上书李鸿章的失败后果使孙中山认识到这个真理。

孙中山却是与时俱进，从首次政治活动的教训中获取了深刻教益，不再囿于“和平之手段”，踏上民主革命的道路。他跨越了原先的起点，让自己的思想和实践达到新的高度。在他看来，挣脱殖民主义、封建主义的双重桎梏是近代化得前提。帝国主义的利益“首先在于中国永远成为工业落后的牺牲品”，所以，对中国实行“政治力”与“经济力”的扼制手段。“政治力”包括“军事侵略”、“外交侵略”。“经济力”则泛指“洋货的侵入”、“外国银行的纸币进入市场”、“汇兑的折扣”“存款的假借”、“进出口货物的运费”、“租界与割地中的赋税”、“地租和地价”、“特权营业”和“投机事业”。封建主义则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

主要内在阻碍。不仅因为封建土地所有制是贫困落后的根源之一，还因为昏庸统治者的弊政为侵略者提供了压榨中国的可行性，甚至成为“洋人的朝廷”，确是“荼毒苍生，一蹶不振”。他从实际斗争中愈益认识到“政治不良”，“无论什么问题都不能解决”。而新制度的诞生不能指望上书请愿，决意采取“强迫”手段，把武装斗争提到十分重要的高度。至于“实业化”即“发展中国工业”乃是“必须进行的大事”，因为“文明进步，必赖乎此”。他十分清楚小生产和自然经济的狭隘，懂得近代化、社会化大生产的先进性。面对当代物质文明的发展，他没有如同民粹派之类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怀有的“恐惧和伤感”。他把自己的社会经济纲要主要归结为两点：“不外土地与资本问题”。土地方案的主要内涵为“平均地权”、“土地国有”，较之最初在《农功》、《上李鸿章书》表述的观念增加了关键性质的制度变革元素。资本问题则分为两个重点：“节制资本”和“发展国家资本”。更本目的在于促使积贫积弱的中国尽快像“英国、美国一样富足”，同时改善民生和防止“垄断”。他在“屡遭艰难顿挫”的处境下完成了《实业计划》，具体构思了“实业化”的内容和布署：优先发展运输业，强调重工业的基础作用，注重农业的建设，作到“农工商矿，繁然待举而不能偏废者”。他在“步泰西之法”的过程中力求“避免其种种弊端”，并且不“随西方文明之归路径而行”。孙中山极为关注政治——“国家的最大问题是政治”，毕生致力于缔造共和与民主建政，反对封建帝制和假共和，确信“一个新的、开明而进步的政府的建立”必将“为我们未来的积极发展打下基础”。科学、教育、文化事业的“更新”与“发展”，当是近代化的必要条件。开放主义亦为孙中山所大力倡导，开放对闭关自守的社会也意味着重大改革。在世界愈益融为一个有机整体的时代，“闭目塞听”只能徒贻“荒岛孤人”之讥。当然，孙中山确认国家主权是不可侵犯的。综观他近40年的思想和实践，可以充分感受和认知他的艰苦探索和

追求。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作为民主革命先行者的孙中山兼为近代化先驱。

郑观应和孙中山的生命都终止在20世纪20年代前期。不同的历程拉开了他们的历史地位与作用之间的距离：一位是卓越的爱国、进步思想家和实业家；一位是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与近代化先驱。

但是，30年前的友谊、交流和共识作为历史记忆长存，令人缅怀，亦复发人深省。更为重要的是：传承改革、开放和近代化得优秀传统文化，吸取历史的经验与教训，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注释：

- [1]梁启超：《清代报》一百册祝辞。
- [2]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483页。
- [3]宫崎滔天：《孙逸仙传》，载《建国月刊》第五卷第四期。
- [4]《郑观应集》下，第1516页。
- [5]《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7页。
- [6]林百克：《孙逸仙传记》（徐植仁译），三民公司，1926年，第157-161页。
- [7]《孙中山全集》，第7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9页。
- [8]《盛档》，上海图书馆藏。
- [9]《盛世危言》（十四卷本），“垦荒”。
- [10]《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8页。
- [11]《郑观应集》下，第198页。
- [12]《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5页。
- [13]《盛档》，上海图书馆藏。
- [14]《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0页。
- [15]《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页。
- [16]郑观应：《盛世危言增订新编》，第三卷，商务。
- [17]郑观应：《盛世危言增订新编》，第三卷，商务。

（作者单位：广东省社会科学院）